

新
民
說

余英时文集

第八卷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
(下)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國正常大學出版社



余英时文集

第八卷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
(下)

余英时 著
沈志佳 编

Wenhua Pinglun yu Zhongguo Qinghuai (Xi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责任编辑：汤文辉 李 琳 邓 宇

封面设计：刘 凇

版式设计：陆润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 下 / 余英时著；沈志佳编.

2 版.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余英时文集；8）

ISBN 978-7-5495-5395-2

I. ①文… II. ①余…②沈… III. ①文化学—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303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524002）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2.875 字数：32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2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4 000 册 定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余英时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即将面世,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友人沈志佳博士通力合作的最新成果,让我首先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但是我必须赶紧补充一句,对于志佳而言,这“感谢”二字是绝对不够用的。像前十卷一样,从集结到编定,她为这两卷文集做了无数劳心而又劳力的细致工作,她在《编者后记》中已透露此中消息。

最使我感动不安的,志佳自己的职务一向很繁重,接掌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务以后,更是如此。但是十几年来,她竟在繁忙的专业之外,硬挤出时间来,先后为我编出了十二册文集。由于志佳和我是史学界的同行,她编我的文集无论是主题的选择、分类,或系年等方面,都井然有序。因此我的作品才能够以系统性的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得到这样一位富于“理解之同情”的编者,我当然感到十分欣幸,但每一念及她的辛苦和牺牲,则又不胜其惶悚。

《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的重点各有不同,《编者后记》已予指出,这里不必重复。这部文集的最早四卷是2004年出版的,十卷本(第五至第十卷)则是2006年出版的,距今已整整七年。现在第十一、十二卷的刊行可以说是承先启后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此中原因并不难寻找:志

佳一直在收集我最近七年来的新作;她将这些新作和以前未收但性质相近的旧作聚拢在一起,新的文集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志佳告诉我:她对于第十二卷以下已有初步构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拭目以待。

这部文集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论题繁多,初看似有泛滥无归之势。因此我想简单地概括一下我的治学宗旨,以供新一代读者参考。

上接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议,我采取了下面的假定:我承认人类文化大同小异。因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通,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可以相通。但因为“小异”,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复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则特色也越显著,目前讨论得很热烈的古代“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s)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史例。在这一假定之下,我的历史研究自始即以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为最后归宿。由于文化特色无所不在,不是仅从思想或哲学一端所能掌握得住,因此我在思想之外,还要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去查看这一特色是如何体现的。但我并不把各部门完全分开讨论,而是从整体的(holistic)观点查其互相之间的关联与会通,因为文化特色往往在此关联与会通之处显现。

又由于文化特色并非一成不变之物,而必然在历史流程中逐步演变,因此我的研究也不能限于任何一个时代。大体上说,我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

上面提到,我对于中国文化特色的探求直接导源于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论。这就是说,如多数现代的中国学人一样,我的文化关怀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我深信文化之“大同”,因此对五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两大普世价值始终抱着坦然接受的态度,至今未变。但是对于很多五四知识人一方面将“科学”推至“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极

端,另一方面又将清末以来“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邓实[1877-1951]语)的态度发展到顶峰,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所以追溯到最后,我试图在传统的方方面面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色,除了历史求真之外,同时也希望脱出上述两种偏颇,而寻求一条比较顺适的中西文化会通之道。

相应与这一文化关怀,我的阅读和思考范围往往不能不越出我的教研专业,即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了突出中国的文化特色,我有时也必须引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因为文化特色只有在互相比较中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为了展示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所经历的种种危机,我甚至不能不把我的史学研究扩展到20世纪。

以上概括只是提醒读者,我的文集虽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一气呵成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预设(assumptions)、中心观念和价值关怀,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机地联系起来,包括第十一、十二两卷的文字在内。有心的读者试一披寻,当可自得之。

余英时

2013年10月27日于普林斯顿

原序 一

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费心费力编成的。她近几年来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论著,分门别类,重新编排。这里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印行这四卷《文集》,先后也很费周章。我必须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 世纪 50 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可见这是一切治学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这两句诗来自解了。

1901 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在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很明显的,通过当时日本史学界关于“东洋史”的研究,他已

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欧洲史的分期模式。梁氏这篇论文是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学》一文同样重要。就他所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基本概念而言,他确实拓宽了中国史研究的眼界,其贡献是很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而言,他却在无意中把“西方中心论”带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欧洲史分期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使许多中国新史家都相信西方史的发展形态具有普世的意义。以西方史为典型,中国史直到清末都未脱出“中古史时代”,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便明白承认:“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见第二编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期的绝对准则。现代中、西之异主要是两个文明体系之异,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中古”与“近代”之别。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化(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但是我十分不赞成“削足适履”式的比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史的全面歪曲。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变作一种历史通则,应用于俄国史的研究上面。这一强烈抗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学论著,虽然写作的时间有迟有早,大体上都是从上述的立场出发的。我诚恳地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余英时

2004年3月21日

原序
二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博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史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传统文化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

入中国史的专业,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余英时

2006年元旦

目 录

第八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 1 文化评论的回顾与展望
- 8 文化建设私议
——人文学术的研究是当务之急
- 20 科技文化与大众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化变迁
- 32 对塔说相轮
——谈现代西方的思想动态
- 43 《对塔说相轮》补篇
——对评者的答复
- 60 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
- 81 戊戌政变今读
- 99 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
- 120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自序
- 124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

- 137 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
- 148 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
- 169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
——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 201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 226 眼前无路想回头
——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
- 286 江宁织造曹家档案中的“西花园”考
- 293 《懋斋诗钞》中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两首诗考释
- 310 侠与中国文化
- 377 翻译与外来观念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序
- 387 东西方汉学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
- 391 怎样读中国书
- 397 编者后记 / 沈志佳

文化评论的回顾与展望

文化评论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受注目的一种思想活动。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文化评论尤其容易引起亲切之感,因为整个 20 世纪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大部分都可以概括在文化评论这一范畴之内。五四号称“新文化运动”,当时人们对于中西文化展开了极其广泛的评论。但早在五四以前,报章杂志上已不知刊出了多少篇有关东西文化的评论文字了。文化评论作为五四的余波一直延续到 30 年代的中叶,然后在 50 和 60 年代又重新在台湾和香港燃烧了起来。

1949 年以后,文化评论基本上中断了。终于在 80 年代,随着开放政策的实行,这一股长期积压的冲力像洪流一样破堤而出。这才产生了所谓“文化热”现象。

20 世纪中国的文化评论有它的特色,但也有它的内在限制,这两方面是一直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不妨略举两三端。第一是它的焦点始终放在中西文化的异同和优劣上面,而且壁垒分明。大致说来,比较激进的人偏向西方文化,比较稳健的人则左袒中国文化。但因此文化评论变成了文化表态,双方争辩虽然有时很激烈,却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沟通。第二是宏观的取向,评论家对中西文化都表现出一口吸尽西江水的气势。不可否认,宏观的文化论断是很必要的,而且

也是很有用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抓住文化整体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长期停留在宏观的层面,而不进入微观分析的领域,则我们将会流入空洞与抽象。前面所提到的以文化表态代替文化评论的趋向也与此有关。第三,中国的文化评论往往是政治评论的伪装。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文化论战,80年代的“文化热”,都是最明显的例子。

以往的成绩和限制告诉我们:文化评论今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已不能自限于从五四到80年代这一传统之内了。下面我想谈谈今天文化评论在西方世界的一般状态,以为借镜。但是我只能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有限范围略作推论,希望读者不要求全责备。

文化评论在西方还是很新的观念,虽然在事实上这种活动早已存在。50年代中期我初到美国的时候,“文化”这个名词主要流行在人类学家之间,功能学派的社会学家(如帕森斯)还留给文化以分析的地位,其他社会科学家则很少认真地讨论文化问题。所以那时只有政治评论、社会评论、文学评论,而没有文化评论。西方最引人注意的一次文化评论,从我记忆所及,大概要数英国斯诺(C. P. Snow)关于“两个文化”的演讲。那是1959年的事,斯诺评论“科学的文化”和“文学的文化”之间已完全失去沟通,而且距离越来越大。他认定这是极不健康的现象,必须赶快改正。这篇演讲词不料竟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在英国更激起了无数的辩论。1963年斯诺又补写了一篇长文答复他的批评者,并对原讲词的论点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和修正。

这是西方在50年代以后最重要的一场文化评论,但集中在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上面。全面的发展还要等到70年代以后才真正来临。

今天文化评论在西方已大有无所不在的趋势,所谓无所不在可

以这样解释,即在思想方面能激起读者热烈而广泛反响的著作,无论来自哪一门学术专业,几乎十之八九都可以划入文化评论的范畴之内。例如史学家怀特(Hayden White)在1978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Tropics of Discourse*)便以“文化评论集”(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为副题,他所以采文化评论之名便是因为集中所研究的虽然是现代思想或观念,但全书主旨则在打通史学、文学批评、哲学以及人类学等各种门户,以建立一种通识之学,遍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又如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70年代以后的许多著作^[1]也是朝着文化评论的方向走,他一直认为分析哲学已走到了尽头,在所谓“后哲学文化”中,继之而起的是文学评论、社会科学的诠释化之类。他正确地指出今天“文学评论”的范围已扩大到一切作品,包括哲学、神学、社会理论、革命纲领等方面,早已不是旧日“文学”的概念所能容纳的了。因此他建议“文学评论”应改称为“文化评论”(culture criticism)。另一位专业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不久前刚刚出版一部大书,讨论现代西方的自我问题,颇受时流推重。此书一变分析哲学的枯燥与专技面貌,即使不专治哲学的人也可以读得津津有味,其原因便在于它取材广博,遍及宗教、文学、社会学等,而又能扣紧关于人生意义的哲学问题。所以它也是一本文化评论的作品,上面不过随手举例,以见文化评论之无所不在。其他各专业中类似的东西实在不胜枚举。德国哈贝马斯的社会科学专著、法国德里达的文学评论之作,之所以在英、美风行一时,也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了文化评论的新园地。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赫尔施(E. D. Hirsch, Jr.)更直接插手文化评论,他在1987年所写的《文化识字论》(*Cultural Literacy*)竟和布鲁姆(Allan Bloom)的《美国心灵的封闭》同时轰动了文化思想界,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为什么文化评论今天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的总汇之地呢?

为什么激进派、保守派、自由派的思想家和作家最后都把目光集中在文化这一领域呢?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答的。我在这里姑且提出几个简单的观察。文化评论的兴起说明了西方学术思想界在最近 20 年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思想、观点的多元化。20 世纪中叶占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西方中心论等观点自 60 年代末以来受到严重挑战。在这一方面“新左派”的出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西欧诠释学的新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随着观点的多元化,文化多元或分歧的观念逐渐受到重视。人类学家对于文化多元论的流行贡献最大,但“文化”已不限于民族或社群,而可以指人类活动的各种精神层面,所以“科学文化”、“文学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等名词才大行其道。其次是思想观点的多元化引起各专门学科之间互相沟通和对话的需要。在学术分工日趋专门化的今天,外行人已不可能听得懂内行人的话,因此沟通和对话无法在任何一门专业领域内进行。如果大家要找一个超越的领域进行沟通和对话,则“文化”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例如哈贝马斯所要建立的“生活世界”(lifeworld)即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会面和沟通的一个“超越场所”(transcendental site)。而他的“生活世界”正是由语言和文化两者构成的。^[2]

我的第三点观察是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界对于文化这个精神领域越来越重视。这也是文化评论今天特别流行的一个内在因素。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文化的定义问题,因为这是徒劳的事。早在 50 年代人类学家分析“文化”一词,已列举了一百六十多个用法,今天更不知要添多少倍了。但一般而言,多数人都同意文化是与信仰和价值有关的一套意义系统和象征系统。所谓对文化越来越重视,即承认文化是一独立自主的力量,不是社会经济制度或政治权力的寄生物。过去在实证论主流支配之下,文化一向是被认为没有自主性的,因为

它是被社会、经济或政治——分别地或共同地——决定的。实证论的社会科学家和更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如此。自实证论的主流逐渐衰退以来,文化的自主性便日益受到肯定。甚至主流派的社会学家如帕森斯和马克思主义者如意大利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也都先已为文化自主说铺了路。帕氏划分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至少承认文化在分析层次上有自主性。葛氏因为看到无产阶级心甘情愿地(至少不自觉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之下,于是提出了“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霸权)之说。不过分析到最后,帕氏仍以社会系统是更为基本的,格氏也逃不出下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说,文化自主的观念在他们那里还是建立不起来。近20年来,情况则大为改变。诚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最近文化研究的发展已汇流了,即强调文化是自主的,而不是社会结构的从属物;意识形态或信仰系统的意义也绝不能由社会行为上得到解释,而必须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系统或类型来加以研究。^[3]更有趣的是最近五六年刚刚兴起的一个左翼的文学评论的流派——新历史主义派——竟也把文化提升到决定一切的高度。所以怀特批评道:新历史主义所说的历史系统即是文化系统。他们把社会制度与实践,包括政治在内,都看成是这个系统的功能,而不是相反的情况。^[4]前面已指出,怀特本人便是一位文化评论的健将,但他也感觉新历史主义未免走得太远了。

上面的简略的讨论大致有助于说明今天西方文化评论在学术思想史的一些根据。但更重要的还是现实人生上的根源。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在最近20年来确有人生意义的重大危机。“意义”的问题最后必然诉诸“文化”才能进行有效的讨论。文化评论显然是和意义的危机分不开的。例如宗教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意识形态的终结的问题(以及两年前美籍日人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问题)等都是文化评论中争辩得最热烈的题旨。这些问